

關於韋伯的早期法律史著作的討論

基法四 賴威豪

壹、導論

馬克思韋伯的法律背景並不是新聞。早期從事韋伯研究的學者就已經注意到，他的學術生涯始於法學，更確切來說，法律史領域，其兩部主要的早期著作：《論中世紀商社的歷史》(*Zur Geschichte der Handelsgesellschaften im Mittelalter*)，和《羅馬農業史對國家法與私法的意義》(*Die römische Agrargeschicht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das Staats- und Privatrecht*)，都是歷史性的，而非我們今天會稱為社會學式的研究，同時，它也非我們今天習慣會看到的釋義性的或規範性的研究。然而，即便是在韋伯思想的研究中，韋伯的早期著作少被專門的、或至少花上篇幅處理。例如 Reinhard Bendix，儘管提到了上述韋伯最初的兩部著作，也注意到他靠著它們取得了柏林大學的羅馬法和商法的講師資格，但在刻劃其早期研究並論述其基本思想方向的時候，這兩部作品完全沒有被提及。¹較近的 Fritz Ringer，甚至根本沒有提到它們。可以想到的原因在於：若著眼於文本本身，這兩部文本構成了極大的理解障礙，它們的主題首先是小眾且高度專業的，並且整個論述缺少一個非常清晰、足辨識的結構，亦即，其問題意識、發現、推論都需要相當心力去解讀，最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他們沒有譯本，限制了學術社群的研究能力。若著眼於學術社群，由於韋伯被廣泛地作為一個社會學家來認識，並且由於具全球影響力的詮釋學圈，如美國社會學和戰後德國的社會學界，在繼受韋伯時所抱有的關懷，讓理解韋伯的焦點大大地集中於特定的主題上。這些觀點尤其體現在教科書或總論性著作中對韋伯的刻畫裡，例如在近年出版的《古典社會理論和現代社會》(*Classical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ety*) 裡，作者 Edward Royce 對幾個耳熟能詳的韋伯關鍵字或主題進行的刻劃，如理性化、現代性、資本主義、官僚、卡

¹ Reinhard Bendix, *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London: Routledge, 1998), pp. 25-26; 37-70

理斯瑪、世界的除魅、科學與價值等等，正反映近幾十年對韋伯的學術側寫：現代性和社會諸領域的理性化的理論家。²顯而易見的是，早期著作與此學術側寫並不完全相容，從而經常僅被視為某種思想過渡階段，與後期的核心文本（*core texts*）頂多有片段的、偶然的關聯，如果不是毫無關聯的話。一個重要的詮釋者正是如此。著眼於社會學蘊含，以及將它們界定為資本主義發展史的研究的一環，Dirk Käsler 在其著名的導論裡，對兩部早期法律史著作做了詮釋，例如，關於《商社》，他認為「在韋伯寫來當作畢業論文的首部學術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圍繞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問題被提出。」³關於《羅馬農業史》，他也認為「韋伯在朝向一個我們看到已經在畢業論文中建立起來的方向移動：探索資本主義經濟管理的發展的諸條件」⁴。

然而，韋伯的早期著作在解讀韋伯思想的重要性上，是否只有上述所談的這種可能性？關於韋伯的學術抱負和思想方向的形成，有些研究指出，和他的獨特家世有關。Guenther Roth 指出，韋伯的家世——在 19 世紀全球貿易中扮演要角的商業家族——帶給他獨特的視野，並影響其學術志趣。他觀察到，韋伯的作品相較於其他同代德國作家，它們本來就有些「去民族」，沒有那麼多對德意志的特殊優越性的訴求，也沒有那麼多流行的反西方文化悲觀論，而這讓英美世界的韋伯繼受沒有那麼多的阻礙。他認為，這是因為韋伯打從一開始就有一個「世界主義」（*cosmopolitan*）的家庭，這協助它培養了一個不那麼「在地的」視野。例如，韋伯對德國易北河以東的農業資本主義以及證券和期貨交易的研究，對他而言，多少是一個家族事務。他多少視其家族成功的模式為德國政策的模範，和其德國的經濟政策對手——傳統農莊地主等反資本主義市場的勢力——的反證。⁵儘管

² Edward Royce, *Classical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5), pp. viii-xi; 91-93

³ Dirk Käsler, *Max Weber: An Introduction of His Life and Work*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 28

⁴ Dirk Käsler, *Max Weber: An Introduction of His Life and Work*, p. 31

⁵ Guenther Roth, *Max Weber: Family History, Economic Policy, Exchange Refor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5 (2002), pp. 509-520

Roth 沒有對韋伯的兩部早期著作進行詮釋，但由於它們很大程度上也是圍繞著商業活動的歷史論著，這讓我們可以去猜想，它們是否也體現了這個有深遠影響的家族視野。Joachim Radkau 就做如此想，認為在《羅馬農業史》中討論農莊大地主時，有時可以看得出來他心中想的是德國東方的農莊地主。⁶且 Radkau 也同樣認為，家庭生活是一個刻在韋伯的思考中的根本經驗，它的型態和對經濟的意義，是詮釋者所未注意到的主題。⁷

如果我們能視早期著作不只是一個某種過渡階段，而是一個不斷發展的一個視野的一部份，則它們在韋伯思想中的潛在意義就不同。基於此構想，有些人開始試圖重新思考早期著作的意義和其與所謂核心文本之間的關聯。本文的目標就在於整理這些討論。本文首先會從《韋伯手冊》（Max Weber Handbuch）所撰寫的關於兩文的詞條切入，再進一步探討其它對該些文本的討論。

貳、《中世紀商社史》

首先是《商社》，以下的摘要是從 Georg Christ 為《韋伯手冊》寫的詞條中抽取出來的。英譯本譯者 Kaelber 也有詳盡的摘要和成書前後的人物誌可以參考。⁸

《商社》是一部完整的法律史著作，並且也被接受為如此。作為一個歷史法學派的學生，韋伯的目標在於分析在南歐的公共商社（*offene Gesellschaft*）和有限商社（*Kommanditgesellschaft*）這兩個法律制度的歷史。他並非這個領域的開路先鋒，他的老師 Levin Goldschmidt 和同門前輩 Wilhelm Silberschmidt 已經有一些成果，韋伯在研究取徑上並沒有跟他們不一樣，他也自認為，自己沒有什麼新觀點，

⁶ Joachim Radkau, *Max Weber: A Biography* (Cambridge: Polity, 2009), p. 75

⁷ Joachim Radkau, *Max Weber: A Biography*, pp. 7-8; 406-407

⁸ Lutz Kaelber, *Max Weber's Dissertation,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vol. 16, no. 2, pp. 27-56

其工作比較像是修正和更具體化既有的成果，雖然這個限定可能反映的是不想正面與 Goldschmidt 展開論戰的考量。在實質主張上，韋伯首先反對了將它們看成是從羅馬法直接發展而來的觀點，理由主要在於，羅馬法的 *societas* 制度只規定了內在關係，而商社是第三方也不能忽略的事實；之後，韋伯又反對了由 Silberschmidt 所提出，認為 *Kommenda* 制度直接發展出公共和有限商社的觀點。理由主要在於 *Kommenda* 在許多地中海沿岸城市中，它僅停留在獨立的出資人與獨立的經營人之間的合作，並沒有發展出對第三人的連帶責任（*Solidarhaftung*）、獨立於個人財產的特別資本（*Sondervermögen*）。韋伯認為 *Kommenda* 是在家庭成員，如兄弟之間，彼此作為夥伴（*Familiengenossenschaft*）所合作經營的事業的應用中，與家產制固有的家產觀念與連帶責任觀念相結合，才出現了公共商社所具有的連帶責任和特別資本。有限商社的特別資本亦是部分城市當中的 *Kommenda* 特別實踐所發展而來的，在一個稱為 *societas maris* 的制度中，複數個出資人與同一個經營人簽約，經營人則會用一個特定的代表出資人們的商標（*Schutzrecht*）從事買賣，韋伯認為在這裡才看到商社的特別資本出現。韋伯進一步發展了一個假說，他認為，有限商社與公共商社其實是平行有別的、而非接續發展的產物，其理由主要在於契約當事人之間的關係是否平等，在兩個制度的前身並不一樣，在前者是不平等的出資者和經營者之間的遠洋貿易契約，而在後者則是平等的家族成員組成之家族產業契約，儘管韋伯認為後者事實上也發展出一些較次要的責任限制，但這個限制的出現與遠洋貿易的出資者的責任限制的出現是相互獨立的。Christ 推測，韋伯關於可能自公共商社發展出來的有限責任的討論，可能反映的是有限責任公司（*Gesellschaft mit beschränkter Haftung, GmbH*）的德國立法爭議，他可能受 Goldschmidt 影響，認為有限責任的概念在有限責任公司出現之前已經可以看到了，且作為一個歷史法學派的論者傾向於讓這些制度變得可以運用，而不是制訂沒有歷史脈絡的有限責任公司。⁹

⁹ Georg Christ, *Zur Geschichte der Handelsgesellschaften im Mittelalter* (1889), Max Weber Handbuch (J. B. Metzler, 2020), pp. 203-206. <https://doi.org/10.1007/978-3-476-05142-4>

Christ 提到，《商社》的受眾是一群熟悉歷史，知悉其論述的事件、文化與經濟背景的當代律師，韋伯不需要向他們解釋史料的編輯和運用，也幾乎不去分析中世紀城市中的經濟與市政，從而當代的讀者很難理解它。¹⁰幸虧有幾個詮釋者試圖從中挖掘出值得注意的關鍵。Kaelber 和 Dilcher 分別指出，韋伯如何受到 Goldschmidt 看待法律的取徑所影響，Kaelber 著眼於一致性，亦即，韋伯採納 Goldschmidt 的看法，認為法律的內容受到經濟、社會與文化所偶然地決定¹¹，Dilcher 在歷史法學派的脈絡下，更細緻地分析了其法律研究取徑的內涵，Goldschmidt 認為，商法的發展受到羅馬法的影響，但它發展出今天的形式是為了回應主要是中世紀的普遍且持存的商業利益的需求，而這正是《商社》的立場，然而 Dilcher 試圖更進一步指出，韋伯已經採取了些許不同的一般跟具體觀點，並預示了其之後的發展，亦即，韋伯認為，法律與經濟發展之間並不能先驗地預設一種一致性，法律可以在一個特定歷史情境發展出來後，在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場合被採用為裁判準則，法律發展有某種程度上的自主性，並不可以與經濟發展混為一談。在一篇討論羅馬法與日耳曼法之關係和異同的文章中，韋伯挑戰了日耳曼歷史法學派的觀點，確認了這個自主性。該觀點認為，羅馬法，以其個人主義和私有財產制度作為基礎，帶來了資本主義和其社會問題，而日耳曼法才是代表民族利益的社會之法，韋伯則區分了經濟上的有權者的利益和用來滿足這些利益的法律工具，並認為，一方面資本主義的法律制度也有衍生自日耳曼法的，例如公共商社就是一例，另一方面，羅馬法比較像是社會變遷的徵狀，而非原因，其被採納的直接原因是對羅馬法所具有的形式性、技術特質的追求，而不是直接就是為了經濟利益的實現，有時候形式性的法釋義學實踐反而構成商業利益的阻礙。¹²Dirk Käsler 亦認為韋伯試圖在此對尤其是歷史法學派日耳曼主義者的“心

¹⁰ Georg Christ, *Zur Geschichte der Handelsgesellschaften im Mittelalter* (1889), p. 208

¹¹ Lutz Kaelber, *Max Weber's Dissertation*, pp. 33-34

¹² Gerhard Dilcher, *From the History of Law to Sociology: Max Weber's Engagement with the Historical School of Law*, *Max Weber Studies*, vol. 8, 2, pp. 169-178

胸狹隘的愛國主義”立場，以及將所謂個人主義的羅馬法的發展與私有經濟的資本主義的發展等同在一起的觀念，提出意見。¹³

此外，他們也都提及韋伯已經在此時對社群(*Gemeinschaft*)和社團(*Gesellschaft*)兩者之間的區分，有一定程度的認識，Dilcher 僅觸及這個議題¹⁴，Kaelber 則更細緻地談到，韋伯在談到家族產業時尤其注意到區分家庭作為消費社群和生產社群，和以之為基礎，為了經濟生產目的而逐漸成為社團、採取公共商社並逐漸發展出記帳工作(*accounting*)、從而某種責任限制的家族產業¹⁵，這個分析對理解韋伯而言至關重要，對他而言，家戶關係不只是親屬關係，還有同居、獲取活動(*acquisitive activity*)，因此有形成社團關係、作帳區分哪些收入與支出是共同的、哪些是個人的需要，Kaelber 以此論證說，韋伯的興趣焦點在於「去屬人化」(*impersonalization*)，並延伸這個觀點到前述韋伯對從公共商社發展出有限責任的討論，認為韋伯的討論核心意義在於，城市的興起帶來更進一步的去屬人化，營利導向的手工業商社取代了家族產業成為事業的中心，建立了更嚴格的集體、個人財產區分，才因而呈現出一種限制連帶責任的傾向。¹⁶

最後，Kaelber 和 Dilcher 也雙雙都注意到了資本主義這個問題意識。Dilcher 試圖將商社的討論嵌入更廣的學術脈絡，即現代羅馬法、日耳曼法與現代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並強調其分析已經預示了後期圍繞理性化的問題意識展開的立場¹⁷，Kaelber 強調商社顯然初步刻劃了韋伯所謂的現代資本主義企業¹⁸，並細緻地分析

¹³ Dirk Käsler, *Max Weber: An introduction to his life and work*, pp. 27-28

¹⁴ Gerhard Dilcher, *From the History of Law to Sociology: Max Weber's Engagement with the Historical School of Law*, p. 183

¹⁵ Lutz Kaelber, *Max Weber's Dissertation*, pp. 39-41

¹⁶ Lutz Kaelber, *Max Weber's dissertation: An analysis (and a comparison to his habilitati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Juridico-Political Concept Formation in Hans Kelsen and Max Weber*, Ian Bryan, Peter Langford and John McGarry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p. 210-212

¹⁷ Gerhard Dilcher, *From the History of Law to Sociology: Max Weber's Engagement with the Historical School of Law*, p. 184

¹⁸ Lutz Kaelber, *Max Weber's dissertation*, p. 36

了《商社》在三部後期作品中的影響，比如在由講堂筆記構成的《經濟通史》中，韋伯視現代資本主義企業的核心要素之一是公司財產與個人財產，透過簿記所獲致的法律上的分離，以及在分離之上的契約當事人對商社債務的連帶責任，韋伯在這個脈絡中強調了義大利城市中的商社的重要性，亦即，簿記的發明與逐漸自家庭分離出來的商社，而在《新教倫理》的論辯中，韋伯對義大利城市商人的研究也幫助它辯護其歸於入世禁慾主義對現代資本主義興起的重要性，他認為，誠然義大利商人已經發展出一種營利心態，從而是資本主義的，但別於如 Benjamin Franklin 所體現的、具有規範實踐意涵的理性營利活動，義大利商人 Leon Batiste Alberti 體現的僅是一種工具理性，而韋伯認為這儘管能夠促使他們去「冒險」、發展出冒險資本主義，但卻不能發展出現代資本主義需要的理性的生活指引（*Lebensführung, conduct of life*）。最後，在為《社會經濟學綱要》（*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所寫的、日後成為《經濟與社會》的討論裡，韋伯也討論了區分出一個獨立的公司和會計技術在現代資本主義的起源中的重要性，以及再次用義大利城市的商業社團為例子討論從家戶到事業的去屬人化的轉變。¹⁹

參、《羅馬農業史對國家法和私法的意義》

接下來是《羅馬農業史》，以下的摘要是從 Luigi Capogrossi Colognesi 同樣是為《韋伯手冊》所寫的詞條中抽取出來的。

儘管在實質論點上與韋伯有激烈的爭辯，羅馬史大家 Theodor Mommsen 仍稱許其在史料運用和詮釋上都展現了極高的原創性，讓他有如看到了古羅馬經濟史研究的黎明（*Morgengrauen*）。他運用了羅馬土地測量員（*Feldmesser*）的檔案，並從經濟功能和結構的層面，為羅馬法律制度提供了基進的重新詮釋，以致於羅馬

¹⁹ Lutz Kaelber, Max Weber's dissertation: An analysis (and a comparison to his habilitation), pp. 212-219

法學家的通說圖像竟在此研究中幾乎沒有登場舞台。韋伯試圖緊密地連結羅馬的土地系統，所謂的羅馬網格系統（Centuriation, in Latin: *limitatio*），與法律形式。他受 Mommsen 和 Meitzen 所啟發，認為羅馬農業最初具有集體主義性質，而其法律形式亦是作為一個集體的、而非個人的財產秩序，只是他採取更極端的立場，對於兩者所省略的古羅馬社會之並不能直接說是集體主義的那些面向，韋伯都試圖將它們組成一個融貫的、集體主義的整體圖像。但是韋伯並沒有視古羅馬社會僅是一個靜態的結構，他企圖透過秩序的內部變化來理解羅馬為什麼會陷入動亂（Umbruch）。韋伯在為羅馬市民法（*ius civile*）提供集體主義的詮釋的同時，也掌握其個人主義式的異質發展（Heterogenese），例如，構成了要式讓與（Manzipation, in Latin: *Mancipatio*）的本質的農田之根據協定的讓與（Die Veräußerung von Acker nach dem Modus），對韋伯而言就介於作為參與並在一定額度內配享集體農田生產之資格的原始農權（Hufenrecht）之讓與，和一塊私有土地的讓與之間，農田的要式讓與在羅馬促成了就那時代而言不曾出現過的高度的不動產交易。又例如，韋伯認為家長（*pater familias*）根據十二銅表法的制定所享有的遺囑自由權（Testierfreiheit）也促成了集體財產秩序的崩塌，因為遺囑自由創造了被剝奪繼承權的人（Enterbten），促成了他們對土地的饑渴（Landhunger），後者構成了羅馬征服土地的衝動的起點，並改變了羅馬的各種殖民形式，以及與之相聯結的羅馬網格系統的意義。韋伯主張，該系統和殖民在過去表現的是一個地籍社群（Flurgemeinschaft）之平均主義邏輯，但逐漸變成了擴張個人財產的強力工具。韋伯在十二銅表法中，除了看到一方面集體主義的結構，也一方面看到了羅馬法轉向個人主義的潛在因素，他認為它們創造了法律上與經濟上土地權利的鬆綁（Entfesselung）和與之相應的私有財產的概念的前提，更與就征服而來的各種形式的廣大羅馬公有地的、在平民（*plebs*）與貴族（*patricius*）間發生的自由競爭（freie Konkurrenz im Kampf um *ager publicus*）一起，構成了歷史上最無限制的農業領域的資本主義能流通於羅馬共和後期的基礎，亦即，個人、私有財產。韋伯最後也省視了羅馬共和後期的農業資本主義的意義，他認為，共

和後期的寡頭統治者在土地上的投資，比如指派一個特別的莊園事業經理人（*vilicus*）來管理遠離城市的、由奴隸運作的農莊（*villa schiavistica*），其背後的邏輯不像是當代的企業家的、不斷為了賺取更多營收的邏輯，因此他不像以前的作家一樣專注於農莊是怎麼樣一個農業生產單位（*landwirtschaftliche Produktionseinheit*），而是強調待在城市裡、在生產現場缺席的擁有大量土地的所有人的政治霸權地位，和其經濟上的食利者（*Rentier*）邏輯，亦即，農業之導向基本租稅（*Grundrenten*）的產出的特性。韋伯認為這直接導致了農業生產事業的極化（*Polarität*），因為它讓兩種生產組織在農地上併存，一方面，是透過經理人由土地所有人直接領導的、擁有大量土地和人力資本的農業生產組織，另一方面，則是區分土地為好幾小塊並販賣或分配給他人來耕種的農家，而這種下了內部衝突的根源。Colognesi 另外指出，韋伯在這裡還介入了其當代的關於古代經濟的現代主義和原始主義論戰，但在這個論戰中採取一個極自主的立場，一方面，他並不遲疑去運用現代語彙，例如資本主義，去形容羅馬共和後期的經濟狀態，但另一方面，他也運用借自原始主義者的「家戶經濟」（*Wirtschaft des oikos*）概念去描述農業經濟，只是稍微不同於原始主義者，並不將家計經濟看成是羅馬經濟生活的起點，自給自足的組織對他而言是不動產交易衰退、羅馬末期的產物。²⁰

Colognesi 自身就是一個羅馬史的研究者，他認為，韋伯關於農業史的看法在二十世紀緩慢地成為在羅馬農業史研究中發展出來的觀點的一個內在部分，雖然其思想變成主流歷史描繪的過程並不明顯，也少有直接的引用。在例如韋伯對公有地以及其對農業發展的重要性的評估上，也不清楚現代歷史學有多大程度的接受和反省，但他的問題意識卻也成為了當代研究者的議題。至於韋伯在羅馬法律史領域的影響，Colognesi 認為可以說幾乎是零，儘管他所處理的問題，亦即各種形式

²⁰ Luigi Capogrossi Colognesi, *Die römische Agrargeschicht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das Staats- und Privatrecht* (1891), Max Weber *Handbuch* (J. B. Metzler, 2020) pp. 210-213.
<https://doi.org/10.1007/978-3-476-05142-4>

的羅馬網格、未測量的土地和被分配的土地之分別與財產權制度之間的關係，是確實存在的。因此他認為，就算韋伯的詮釋模型太過笨重（整個經濟史），也不適合把所有複雜情況通通納入考量，他認為羅馬法律史學者似乎也不能正當化他們去忽略這樣一個歷史論述所呈現的關聯。²¹

《羅馬農業史》獲得較少的討論。Kaelber 再次著眼於資本主義和社群與社團的區分。在《羅馬農業史裡》，韋伯不曾提過現代資本主義企業的任何元素，在其他作品裡，韋伯也直言古代是沒有資本主義企業的，它也指出羅馬秩序是與現代資本主義秩序徹底相反的政治資本主義（political capitalism）秩序，指出政治特權或優勢經常剝奪了基於市場運作的機會，可見僅僅是有土地交易，對韋伯而言幾乎不能算是什麼經濟發展或變遷傾向的指標。²²最後，Kaelber 認為韋伯在《羅馬史》裡僅運用社群，而不曾運用社團一事，意味著他有一個清楚的區分意識，亦即韋伯認為古代、和僅僅進行交易都不意味著羅馬的農業社群有多大程度往社團化的方向發展²³。

肆、早期著作作為解讀韋伯整體思想的線索

在整合早期作品進韋伯的整體思想的嘗試裡，大多如最早開始進行如此嘗試的 Dirk Käsler 那般，滿足於模糊地指出它們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史的討論之間的關聯。²⁴然而，一來，其實我們並無法一口咬定韋伯在那時就懷著資本主義的問題意識，或說醞釀著他後期的研究綱領，這種素材上的交疊的關聯，更像 Kaelber 所描繪的那樣的素材“再利用”，亦即，在另一個、新的視角下重新省視既有的成果。

²¹ Luigi Capogrossi Colognesi, Die römische Agrargeschicht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das Staats- und Privatrecht (1891), pp. 213-214

²² Lutz Kaelber, Weber's Dissertation and Habilitation, The Anthem Companion to Max Weber, Alan Sica (Ed.) (Anthem Press: 2016), pp. 35-37.

²³ Lutz Kaelber, Weber's Dissertation and Habilitation, pp. 39-41

²⁴ Dirl Käsler, Max Weber: An Introduction of His Life and Work, pp. 28 ;31

²⁵二來，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面向的強調，無可避免地使法律要素退居幕後，然而這兩部早期作品為韋伯爭取到的是法學的教職，我們至少必須考量到它們提出、證明了某個法學上或法律史上的洞見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將其早期作品整合到韋伯的整體思想時，我們有一個好理由將它們視為韋伯仍晦澀的法律思想的線索。

在這兩個考量下，有兩個整合嘗試非常值得關注。其一是 Kaelber 所暗示的「去屬人化」進程，亦即，身分與社會關係的形成機制，從家庭到個人間基於契約而組成的組織的變遷。比如，我們看到韋伯在兩部作品中都觀察到了某種集體秩序崩解並重組為某種個人間的相互關係的變化，而法律觀念一方面因這個進程而變遷，例如《商社》中因商業活動的需要而產生的新的、為羅馬法與舊日耳曼法所不知的獨立之特別資本的概念，另一方面，如在《羅馬農業史》中對遺囑自由的立法的討論那樣，法律觀念也會促進這個進程。實際上，我們之後會再次看到，韋伯極為重視法律的部落或身分團體的屬人性的觀念在歷史中被另一種取代的變遷，並視之為西方現代法律的發展條件之一。²⁶

另一個值得我們的注意的，是 Laura R. Ford 以財產關係（Vermögensbeziehung, property-relationship）之結構為焦點，對韋伯的初期作品所進行的詮釋和討論。Ford 認為，韋伯自《商社》和《羅馬農業史》始就已經著眼於歷史上的社會關係，尤其是人與人為了從事經濟生產與商業活動成結成的各種組織，之於財產法的相關性的意義，並且奠基了其後期的財產的社會學理論。Ford 指出，韋伯認為財產和組織起來的社會關係的結構是相互依賴的，該關係的秩序深刻地影響財產法的內涵。在《商社》裡，韋伯認為是否擁有一個特別資本是公共商社是否存在的標準，而特別資本作為一個法學上的創新，仰賴於商社自身被視為一個有別於契約當事人的實體的觀念能夠擺脫當事人的既有身分而產生，也就是去屬人化的發展。

²⁵ Lutz Kaelber, Max Weber's dissertation: An analysis (and a comparison to his habilitation), p. 220

²⁶ MWG I/22-3, p. 619

Ford 更進一步地指出，韋伯在《證券》（*Die Börse*）論文中，就旨在闡明商業財產關係的非屬人性（*Unpersönlichkeit*），亦即可任意因交換而移轉的財產，以及與它相伴的、取代了地主統治（*Grundherrschaft*）的資本的統治（*Herrschaft des Kapitals*）的意義。²⁷這兩個嘗試都強調了法律觀念與社會關係，尤其是組織、統治關係之間的緊密聯繫，預期了韋伯之後所擁護的法律社會學的基本命題，亦即，法律觀念的發展高度地取決於法律技術環節與政治組織的結構的類型，且僅間接地受經濟因素決定。²⁸從而，我們可以說，韋伯的早期的法律著作應該是可以整合到其後其關於法律和政治組織的思想中的，因為它們是延續著的，但要知道此種延續性的確切內涵，我們必須先省視其最重要的後期作品，亦即，〈法律的發展條件〉（*Die Entwicklungsbedingungen des Rechts*），所謂的〈法律社會學〉（*Rechtssoziologie*），然而，這並非本文所能處理的。

伍、代結論

本文整理了關於韋伯的早期法律史著作本來就不多的討論中的一部分。在這些新的研究裡，韋伯的早期著作呈現為理解韋伯整體思想的線索，文本在被細緻地解讀後，他們都在既有典型的韋伯學術側寫之外，呈現出韋伯思想之較少為人所關注、但仍然關鍵的思想脈絡。它們與上述學術側寫之間的關係為何是個值得探究的有趣問題。它們是否會呈現出一個極為不同的韋伯，還需要更多討論，然而，它們無疑能刺激人們重新反省自己對韋伯的認識和評價，促使我們對社會生活，和對審視社會生活的觀點，進行探究。誠如 Radkau 所言，韋伯是一個永無止盡的主題。²⁹

²⁷ Laura R. Ford, Max Weber on Property: An Effort in Interpretative Understanding, *Socio-Legal Review*, vol. 6, pp. 24-100

²⁸ MWG I/22-3, p. 301

²⁹ Joachim Radkau, Max Weber: A Biography, p. xvii

參考文獻

韋伯著作

Weber, Max. Gephart, Werner/Hermes, Siegfried ed.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Band I/22-3,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Recht.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0.

二手著作

Bendix, Reinhard. 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London: Routledge, 1998

Chris, Georg. "Zur Geschichte der Handelsgesellschaften im Mittelalter (1889).", In: *Max Weber Handbuch*, edited by Hans-Peter Müller and Steffen Sigmund: 203-209. J. B. Metzler, 2020.

Colognesi, Luigi Capogrossi. "Die römische Agrargeschicht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das Staats- und Privatrecht (1891).", In: *Max Weber Handbuch*, edited by Hans-Peter Müller and Steffen Sigmund: 210-214. J. B. Metzler, 2020.

Dilcher, Gerhard. "From the History of Law to Sociology: Max Weber's Engagement with the Historical School of Law." *Max Weber Studies*, vol. 8, no. 2. 163-186.

Ford, Laura R. "Max Weber on Property: An Effort in Interpretative Understanding." *Socio-Legal Review*, vol. 6: 24-100.

Kaelber, Lutz. "Max Weber's Dissertation."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vol. 16, no. 2: 27-56.

— "Max Weber's dissertation: An analysis (and a comparison to his habilitation.)"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Juridico-Political: Concept Formation in Hans Kelsen and Max Weber*, edited by Ian Bryan, Peter Langford and John McGarry: 207-225.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 "Weber's Dissertation and Habilitation." In: *The Anthem Companion to Max Weber*, edited by Alan Sica: 27-44. Anthem, 2016.

Käsler, Dirk. Hurd, Philippa trans. Max Weber: An Introduction to His Life and Work.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Radkau, Joachim. Camiller, Patrick trans. Max Weber: A Biography. Cambridge: Polity, 2009.

Ringer, Fritz. 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Roth, Guenther. "Max Weber: Family History, Economic Policy, Exchange Refor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5. 509–520.

Royce, Edward. Classical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5.